

反通货膨胀论

通货膨胀的理论与实践

刘涤源 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反通货膨胀论

通货膨胀的理论与实践

刘涤源 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粤新登字01号

反通货膨胀论

——通货膨胀的理论与实践

刘涤源 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粤北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3.875印张 305,000字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册

ISBN7-218-00687-6/F·109

定价6.50元

前 言

一、历史教训：恶性通货膨胀 两个实例的严重后果

通货膨胀是货币经济，特别是管理本位（纸币本位）制经济中一种灾难性的社会瘟疫。在通货膨胀演化过程中，由温和的通货膨胀，而爬行的通货膨胀，进而酿成恶性通货膨胀，对全国经济生活中的破坏作用不断加深，最终必然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崩溃，对国计民生的危害极为严重。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40年代国民党政府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就是确凿的历史见证。

国民党政府时期由恶性通货膨胀而导致的那次空前深重的社会灾难，距今已经40多年了，许多上了年纪并曾亲身经历过那次浩劫的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心存余悸。通货膨胀使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全面崩溃的深渊，百业凋敝，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特别是以固定收入为基本生活来源的广大工人、政府一般公务人员、大中小学教师和职工及退休人员等遭受损失尤为惨重。这种严酷的历史教训，我们应该认真吸取，永以为鉴，万万不可掉以轻心，重蹈覆辙。

对上述两次恶性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极端严重后果，本书第六、十二和十四章根据确凿历史资料作了翔实而系统的实证分析和理论概括，读之令人惊心动魄，发人深醒。

二、两种态度：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说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借鉴、利用问题

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随着对外交往的频繁与发展，我国既引进了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也引进了各种各样的经济理论和思潮。但是，究竟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如何参考、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说，早已成为经济学界谈论的重要问题。现实情况表明，这个问题在我国经济界并没有真正解决好。这里出现了互相分歧的两种态度。

一种态度是，有些人对西方经济学说抱着一概肯定、全盘照搬的态度。近年来，对西方经济理论持一概否定、全盘排斥态度者大概已为数日少；相反，持全面肯定、盲目崇拜态度者却大有人在。有的同志误认为战后西方经济的较快增长应完全归功于凯恩斯主义，因此就认为凯恩斯主义应成为我国制订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有人甚至说：中国“近几年一直存在着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对凯恩斯主义采取否定的态度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应该抛弃一切偏见，大胆地引进凯恩斯主义来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①这样，他们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道路和模式对我国是完全适用的，企图照搬凯恩斯主义教义来解决我国的经济发展问题。这是一种态度。

另有一批经济学家的态度则大不相同，对西方经济学说，特别是凯恩斯主义，抱着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既不盲目崇拜，也不一概否定；而是严肃认真地根据我国国情，考虑它们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参考、借鉴和利用问题。凯恩斯主义是以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为背景，救危扶倾，脱颖

^①陕西《社会科学评论》，1988年第6期，第63、65页。

而出的。它所面临的形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商品十分丰裕；而另一方面消费需求不足、市场相对狭隘，两者间矛盾激化，就爆发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所要救治的病症在于为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所生产的，而无法找到销路的商品寻找销路。这就是医治需求约束型经济病症的处方。而当前我国经济的突出问题是生产力低，商品短缺，人民生活水平低，有的尚未摆脱贫困。我国是一种资源约束型经济。因此，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这个救治方案，从其社会哲学、时代背景、主要旨趣到理论体系，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直接对立、同我国当前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的国情格格不入的。因此，我们决不能、也不应该整套照搬，把凯恩斯关于需求管理方案的整个经济理论体系作为我国制订经济发展战略、经济规划和重大经济决策的主要理论依据。当然，对待这个问题也应该一分为二。尽管我们反对照搬凯恩斯整套经济理论体系，但也应该明确承认，其中某些具体论点和方法对我们仍然是有用的东西，可供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参考、借鉴和利用。

综观上述对待西方经济学说的两种态度，我们一向坚持后一种态度，毫不含糊地否定前一种态度。我们确认，那些抱前一种态度者，鼓吹盲目引进西方经济学说，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进程中已经产生了十分有害的影响。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引进西方经济学说教义方面，主要有过三次重大失误：一是“一切向钱看”。说什么：“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这样，就把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风气搞得混浊不堪，影响极坏。二是“高消费”，使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向往虚荣，奢侈浪费，互相攀比，流毒既广且深。三是“温和通货膨胀有益论”，导致明显的通

货膨胀，形势严峻，使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的进程备受干扰，危害很大。后两种失误同上述“大胆地引进凯恩斯主义来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那种态度有着直接关系。这样误解，并且误用凯恩斯主义，不顾我国国情，盲目引进，实有百害而无一利。关于第三个重大失误，这是本书的中心课题，我们将从理论方面加以简明扼要的介评，从中外历史与现实方面进行确凿、翔实而细致的论证分析。

三、一场论争：我国应否利用通货膨胀去刺激经济高速增长

在上述两种态度的基础上，关于如何对待通货膨胀这个重大问题，派生出一场论争；一派主张利用通货膨胀来刺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派则坚决加以反对。

主张通货膨胀者以凯恩斯“半通货膨胀”理论为根据，坚持“温和通货膨胀有益论”，极力主张实行扩张性通货膨胀政策，充分利用其“积极作用”。据说，这种“积极作用”具有三大效应：（1）资本积累效应，（2）优化资源配置效应，（3）促进经济增长效应。他们把通货膨胀看成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积极因素”，因而极力主张推行经济膨胀政策。有人还提出了寻求“最佳通货膨胀率”的主张，认为通货膨胀率太高了不行，会产生绝对的破坏作用；太低了不可能，也不见得对经济有利；真正两全其美的是在一定的通货膨胀率之下，实行一种温和膨胀的政策。有人认为，只要经济增长率大于通货膨胀率，人民币收入增长率大于通货膨胀率，经济运行和货币流通就是良好的，也有人认为，物价指数上升到4%—5%是最理想的目标，在这种不太高的通货膨胀率下，各方矛盾

和利益才比较容易协调。还有人认为，维持通货膨胀率到5%—10%是可以接受的。

另一派则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财政应坚持收支平衡的方针，力争物价（货币价值）的稳定；坚决反对把通货膨胀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确认：如果把利用这种“积极作用”作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则是错误的，并且是十分有害的。那些“温和通货膨胀有益论”者是以凯恩斯的“半通货膨胀”理论为依据的。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对凯恩斯主义的时代背景、社会哲学、根本实质、利弊得失、兴衰势态和历史地位等等学懂弄通，而是一知半解，妄图全盘照搬。现在简要加以分析：第一，“半通货膨胀”的实质是，在经济衰退、失业严重、生产资料大量闲置的条件下，增加通货，促使物价上涨，降低实际工资，这就是增大了剩余价值的剥削深度，引诱企业主增加生产，减少失业人数，扩大剩余价值剥削的广度。这是一种对资本家有利，对工人有害的恶毒计谋。第二，在经济危机深沅期间，增加通货的扩张政策，在一定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收到缓解危机、促进复苏的“疗效”。但这只能起“吗啡”注射的作用。如果注射时期太长、注射剂量太大，势必使经济机体的功能混乱，体质衰弱，涌现出史无前例的严重怪症。历史的教训必须吸取。战后西方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刺激政策：赤字、赤字、再赤字，膨胀、膨胀、再膨胀，1974—1975年“滞胀”型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史中形象最怪诞、内容最复杂、解救最困难的一次危机爆发了。以此为转折点，凯恩斯主义开始走下坡路，终于从“政府经济学”宝座塌下台来，丢下“滞胀”经济的烂摊子，使西方各国整个80年代苦战通货膨胀，付出重大代价。第三，新凯恩斯主义者

吸取了这种教训，近年来放弃这种“吗啡”注射的“处方”，改采预算收支平衡的财政原则。“温和通货膨胀有益论”者企图把西方国家已经吃尽了苦头的废旧“处方”引进来“刺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结果事与愿违，涌现出明显的通货膨胀那种严峻形势，使我国经济改革遭到严重干扰，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波折，实堪痛惜！

四、严重恶果：人民对币值稳定的信心动摇及其启迪效应

马克思关于“货币是价值标准”的论断，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恪遵勿违。通货膨胀的实质含义在于，超经济滥发通货，使货币价值贬值，吸取固定收入者手中的一部分社会实际资源。这种货币贬值实际上是一种“短尺少秤”的欺骗行径。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重视货币价值的稳定性。联邦德国更制订一条规范：“保卫马克”。效果很好，联邦德国马克成为西方最稳定的货币之一。而我国呢？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改革中本应恪守马克思“货币是价值标准”这一教导，确立“保卫人民币”这条规范，严格控制通货的超经济增发数量，使经济改革与经济建设进程中免受通货膨胀的干扰。但是，由于财政金融工作中错误的指导思想作祟，盲目引进凯恩斯主义教条，把最近10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视为头号敌人的通货膨胀奉为至宝，想借以提前实现“四化”。其实这是幻想，而且在本质上这是最大的不守信用。在货币——价值标准这个重大问题上失信于民，这是十分严重的失误。

物价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经济生活，涉及整个政治、社会、经济机制的运行；如果处理不当，

物价水平不断大涨，势必影响经济发展的稳步增长和国计民生的长治久安。物价上涨幅度的加剧过程正是这样：在“通货膨胀有益论”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支配下，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一味膨胀，再膨胀；到头来，严重后果在全国范围内暴露了。1988年下半年，物价上涨幅度大增，这已经不是什么“温和的”通货膨胀，而是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已经不是对经济增长的“有益效应”，而是对国计民生有百害而无一利。形势严峻，人心浮动，预期物价还要看涨，于是爆发全国规模的、空前的抢购商品、挤提存款的风潮。这个风潮是上述错误指导思想的必然恶果。这当然是坏事；但一分为二，它也具有意想不到的启迪效应，那就是：其一，它标志着人民对人民币的前程开始信心动摇，投下一次普遍而强烈的不信任票。其二，它标志着对“温和通货膨胀有益论”者泼了一大盆冷水，向他们大喝一声：“有益”转化成了“有百害而无一利”，让其头脑清醒清醒。其三，它也标志着给党政领导敲一次响亮的警钟，使其意识到问题确很严重，再不能任其继续下滑，而必须悬崖勒马，立即紧急刹车，改弦更张，加紧治理整顿，坚决遏制通货膨胀。

五、财政金融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 对通货膨胀从放纵到遏制

抢购商品、挤提存款风潮标志着通货膨胀已经开始滑向恶性通货膨胀的边缘，经济形势严峻，震动很大，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警惕，立即转变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从放纵通货膨胀转变为遏制通货膨胀。现在，对这个重大转变，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可喜的是，通过两年多的治理整顿，实行

“双紧”方针，取得相当良好的效应：如银行存款恢复到原有水平并且还有超过；如物价上涨幅度确实有所缓解等等。这些事态表明：其一，人民对人民币的前程在信心上已经有所恢复，疑惧情绪有所缓解。其二，通货膨胀虽已到了相当严重的阶段，但还没有达到不可救药的险恶境界。只要彻底消除前几年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和宏观决策上的失误，采取过硬措施，从严治政整顿，继续坚持“双紧”方针，通货膨胀还是能够得到控制和救治的。可忧的是，多年来通货膨胀的后遗症，积重难返，隐患重重：如当前财政收支缺口很大，继续超经济增发大量通货；又如出现市场疲软、库存猛增、生产滑坡以及流动资金紧缺又构成一组新的矛盾。为了启动市场，资金大量迅速投放，预示着信用膨胀有再度加剧的危险。这些新增通货和贷款投放有一个“时滞”，尽管目前还处于沉淀状态，但一旦时机来到，总会涌出来冲击物价，这是必然的。因此，通货膨胀再度加剧的潜在危险正在增加，物价涨幅再度扩大的可能性正在增长。我们对这种隐患，决不能掉以轻心，盲目乐观。

通货膨胀的危害性是十分严重的，它不仅对经济改革进程和经济健康发展有着重大的干扰和破坏作用，而且对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也起着侵蚀和败坏作用。它使整个国民经济衰弱、社会动乱、文化教育退化、道德败坏、人心浮动涣散。它确实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1988年那种物价直线上涨、经济混乱、抢购与挤提风靡全国的严峻局势，使经济改革根本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国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危害，也就根本谈不上持续、稳定、协调增长。这是值得我们永远牢记的一个经验教训。由此，我们总结出—条真理：经济改革的顺利完成，国民经济的健康增长，均以物价水平稳定，通货膨胀真正得到

遏制为前提。脱离了这个前提，什么经济健康成长、国家长治久安，都难以实现，甚至落空。面对这种分外复杂而艰巨的严峻形势，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加倍努力，坚决贯彻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继续坚持“双紧”方针，严防通货膨胀的再度回弹，真正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这是我们殷切的期待。

六、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应如何确立？

现在提出一个问题：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在目标的确立上，究竟应该强调稳定货币，还是应该强调促进经济增长？稳定货币与促进经济增长两者究竟是矛盾的，还是统一的？这是我们应该以严肃认真的科学分析态度去澄清的一个政策界限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所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我们认为，一方面，经济适度增长，也就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这是我们今后既要量力而为、稳步前进，又要奋发向前地充分发挥资源潜力去争取实现的目标。另一方面，与此相反，我们所应坚决避免的是，那种盲目追求的超高速增长、大起大落、不健康、不正常的经济发展，不持续、不稳定、不协调的经济发展，说得具体而确切些，以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而言，那就是在“急于求成”和“温和通货膨胀有益论”那种错误的指导思想指导下，连年大量财政赤字，超经济大量增发钞票与投放信贷，对经济发展妄加刺激、再刺激，造成经济过热，形势严峻的通货膨胀，和比例严重失调而富有水分的超高速增长。上述两种类型的经济增长，指导思想不同，实施原则不同，经济效果（不论是短时期

的或长时期的)也大不相同。一一对比,两者利弊得失昭然若揭,我们必须明确地加以分辨,不容有丝毫混淆。

最近李鹏总理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几次提到了关于通货膨胀的问题,现分别引述如下:

其一,在论述制定这一规划和计划的立足点方面,在肯定我国80年代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明确地把“在经济发展和改革中都出现过求成过急,一度造成通货膨胀”,列为实际工作中出现过的一项失误。

其二,在确定主要奋斗目标和基本指导思想方面,提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这条方针是长期正反两个方面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实现到本世纪末奋斗目标的重要保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最重要的是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防止急于求成的倾向。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各种资源的潜力,促进经济增长,又要防止国民收入超额分配,造成通货膨胀。”

其三,关于经济建设,首先是“继续努力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这里明确指出:“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防止国民收入超额分配和通货膨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从历史经验看,经济发展出现大起大落,主要是指导思想片面追求高速度,建设规模过大,消费基金膨胀,导致国民经济总量不平衡和重大比例失调,最后不得不进行调整。……今后十年,要……避免出现大的波折,最重要的仍然是要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特别是保持财政、信贷、外汇收支和物资的各自平衡以及它们之间的综合平衡。……银行信贷要坚持

稳定货币的方针，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把货币发行量和信贷总规模保持在经济发展合理需要的范围内，避免通货膨胀。”^①

综括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合乎经济规律的经济适度增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同违反经济规律的超高速增长——国民经济畸形发展，两者政策界限分明，不容有丝毫混淆。我们确信，货币稳定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经济适度增长的必要前提。如果货币不稳定，如在1988年那样物价直线上涨、经济秩序混乱的严峻局势下，国民经济必然难以健康发展而陷入重大波折的困境。所以，货币稳定与经济健康发展，经济适度增长，两者结合，相辅相成。只要真正按经济规律行事，财政货币政策应该既确保货币稳定，又促进经济适度增长。这两个目标对财政货币政策来说，是统一的，并不互相矛盾。有人说，我国前几年财政货币政策强调了经济增长，忽略了货币稳定。我们认为，这是违反经济常理的一种说法，似是而非。我国前几年所强调的“经济增长”是违反经济规律的“超高速增长”，弊端重重，这本来就是一个重大失误。在强调“超高速增长”那种错误指导思想的支配下，必然要有意识地利用通货膨胀这种所谓“积极因素”来加速经济建设，也就必然会导致1988年物价大涨的严峻困境，这哪里谈得上“货币稳定”呢？

我们确认，只有坚定不移地确保货币稳定这个目标，才能真正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如果货币不稳定，通货膨胀再度回弹，国民经济必然难以健康发展，甚至还会再

^①上述各段引语均见《人民日报》，1991年4月11日。

度发生重大波折。1988年经济混乱的那种严峻局势，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让其重演。

七、内容提要

本书力求全面展现通货膨胀这个课题的理论造型和实践态势；更紧紧围绕着本书的标题：“反通货膨胀论”这个中心旨趣而展开论证与介评，牢固树立“货币价值标准长期稳定性”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坚强信念；并就通货膨胀对国计民生的严重危害作用，全面而翔实地进行实证分析，澄清“温和通货膨胀有益论”那种错误论调所引起的思想混乱。

具体内容分“导论”和上、中、下三篇，简要提示如下：

首先，在“导论”及其“附录”中，开宗明义向“温和通货膨胀论”展开针锋相对的争辩，义正词严地提出马克思关于“货币是价值标准”的教导，明确指出，通货膨胀政策导致货币贬值，在实质上无异“短尺少秤”的欺骗行为，损伤了这个庄严而神圣的“价值标准”。我们务必要坚定不移地保卫这个货币价值标准，立信于民，造福于国。

其次，上篇述评当今西方经济学各主要流派的通货膨胀理论。值得注意的特点有二：

（一）凯恩斯在《就业通论》中，以30年代经济大危机为背景，提倡“半通货膨胀”的赤字财政政策去救治经济危机，这种政策的长期推行和不断演变，最终导致70年代“滞胀”型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由鼎盛转趋衰败。这里应该强调指出，通货膨胀政策是凯恩斯主义兴衰演变的关键因素。这种膨胀政策同凯恩斯主义的兴衰变幻过程自始至终紧密地结合着。赤字财政的通货膨胀政策，有如“吗啡”注射，具有正、反两面的

双重效应：对经济机能的短暂兴奋作用与破坏危害作用两者同时并存。凯恩斯主义能够采用赤字财政通货膨胀政策去对付那种单纯属于“滞”症的30年代经济大危机，取得一定“疗效”，从而逐渐臻于鼎盛。但好景不常，经济局势终至走向它的反面。这种膨胀政策长期实践招惹出严重“胀”症，同“滞”症并发，形成70年代空前疑难的“滞胀”型经济危机这种双重社会瘟疫；而凯恩斯主义却无法进行救治，结果使它自己从鼎盛高峰倒塌下来，转趋衰败。通货膨胀政策的正、反两面双重效应：基于兴奋刺激作用，使凯恩斯主义得以兴起而逐渐趋于鼎盛；与此同时，基于破坏危害作用，它就必然陷入困境而转趋衰败。由此可见，凯恩斯主义因通货膨胀政策的兴奋刺激作用而兴起、日趋鼎盛的上升过程，也就是因同一政策的破坏作用产生恶果，为自己造成困境，走向衰败的加速恶化过程。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凯恩斯主义的兴盛，在其自身的内部，已经包含着使之趋于衰败的种子。我们只要紧紧扣住通货膨胀政策上述正、反两面双重效应这一要害性的病根，就能将凯恩斯主义这种兴衰变幻的前因后果，一目了然地清理出来。凯恩斯主义经过这一场衰败，现在已开始摒弃赤字财政通货膨胀政策。凡此种种，详请参阅上篇第二章。

（二）其他流派，如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派等，都是反凯恩斯主义的，特别是坚决反对赤字财政通货膨胀政策，坚持稳定货币价值的。其中有的甚至主张恢复金本位来稳定货币价值。

由此可见，“温和通货膨胀有益论”者，对于当代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的通货膨胀理论，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的这一理论及其后果，并未认真研究、确切理解。

再其次，中篇包括各国和地区通货膨胀实例剖析。本书列举的实例中，有两例极端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恶性通货膨胀；另一是40年代国民党政府时期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两者均使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全面崩溃的悲惨绝境，苦难深重，至今令人谈虎变色。为了分篇编排的方便，前例列入中篇，后例列入下篇。两例均属确凿的历史见证。至于现实例证，首先应推凯恩斯主义长期推行通货膨胀政策促使西方国家陷入“滞胀”困境，从此进入80年代苦战通货膨胀的艰难历程。本书选定英、美、加三国作为实例，剖析它们是怎样收拾凯恩斯主义通货膨胀政策所遗留下来的、以“滞胀”为主要内容的这个经济烂摊子的。此外，在拉美国家、东欧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我们也各选二三实例，将其通货膨胀实践历程进行了实证剖析。

从以上这些实例可以看出，恶性通货膨胀恶果累累，祸国殃民，苦难深重，这是大家公认和痛恨的，至于其他实例，尽管还没有达到恶性膨胀的险恶境界，但其危害作用相当严重，治理和遏制须付出重大代价，困难很多，而且容易出现反复。我国应该从别人的痛苦经验中认真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最后，关于我国通货膨胀问题的探索属于下篇，这是本书的重点部分。如上所述，我国人民曾经遭受过40年代国民党政府时期恶性膨胀的深沉苦难，至今记忆犹新，这是值得我们特别警惕的历史见证。现把这段灾难历程的翔实记述列为本篇首章。在思想渊源方面，“温和的通货膨胀有益论”那种论调对我国当今通货膨胀病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影响很坏，我们特辟专章对它简要加以述评。在述评“有益论”以后，紧接着就专章论证通货膨胀的严重危害作用。这一专章从三个角度明